



李正东◎著

河村水会

日常生活、集体行动与生存文化

1978-1987

The River Village: Everyday Life, Collective Action
and Culture of Subsistence, 1978-1987

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正东◎著

河村水会

日常生活、集体行动与生存文化
1978-1987

The River Village: Everyday Life, Collective Action
and Culture of Subsistence, 1978-1987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村水会：日常生活、集体行动与生存文化：1978 ~ 1987 /
李正东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112 - 3602 - 9

I. ①河… II. ①李…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1978 ~
1987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6029 号

河村水会：日常生活、集体行动与生存文化：1978 ~ 1987

著 者：李正东

责任编辑：钟祥瑜

责任校对：张明明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48 (咨询)，67078870 (发行)，67078235 (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zhongxiangyu@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35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2 - 3602 - 9

定 价：4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河村水会

日常生活、集体行动与生存文化

1978 ~ 1987

本书得到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基金（13YS102）
出版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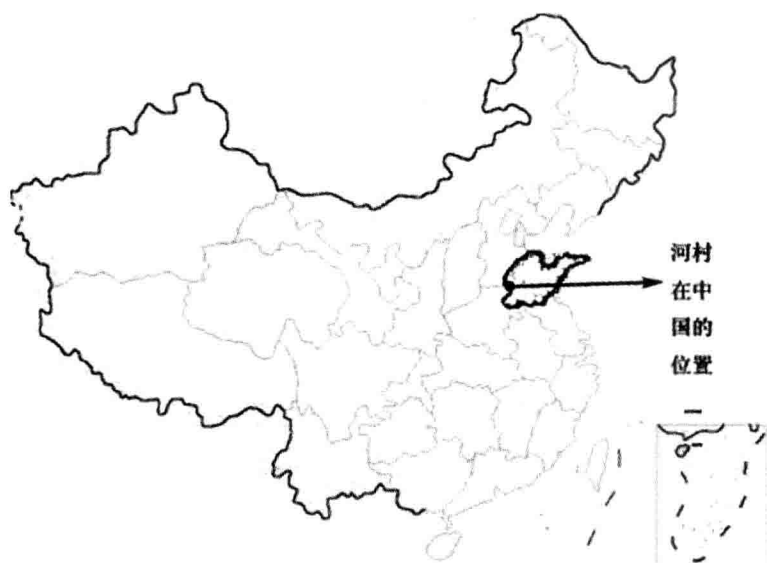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纪念费孝通先生

我在实地调查中才理解到一个社区中众人初看时似乎是纷杂的活动，事实上都按着一套相关的各种行为模式而行动的。……依我们当时的理解，社区是具体的，在一个地区上形成的群体。而社会则是指这个群体中人与人相互配合的行为关系……在接受派克社区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接受了由吴文藻先生为首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方向。

社会学中国化其实就是社会学的主要任务，目的是在讲清楚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当然我们说明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只有实地观察，那就是社区调查。

社区研究只能了解局部的情况，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怎能不落入以偏概全的弊病呢？我们对此提出了比较方法。我想只有从每个社区它特有的具体条件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出发，不同的社区才能相互比较。在相互比较中才能看出同类社区的差别，而从各社区具体条件去找差别的原因，进一步能看到社区发展和变动的规律，进入理论的领域。

……这种社区研究是以农民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出发，分析这种结构形成的过程，它所具有的特点，并看出其发展的前景。……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需要看到人……在我们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人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样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古训指导下应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保留的文书中，而且还应当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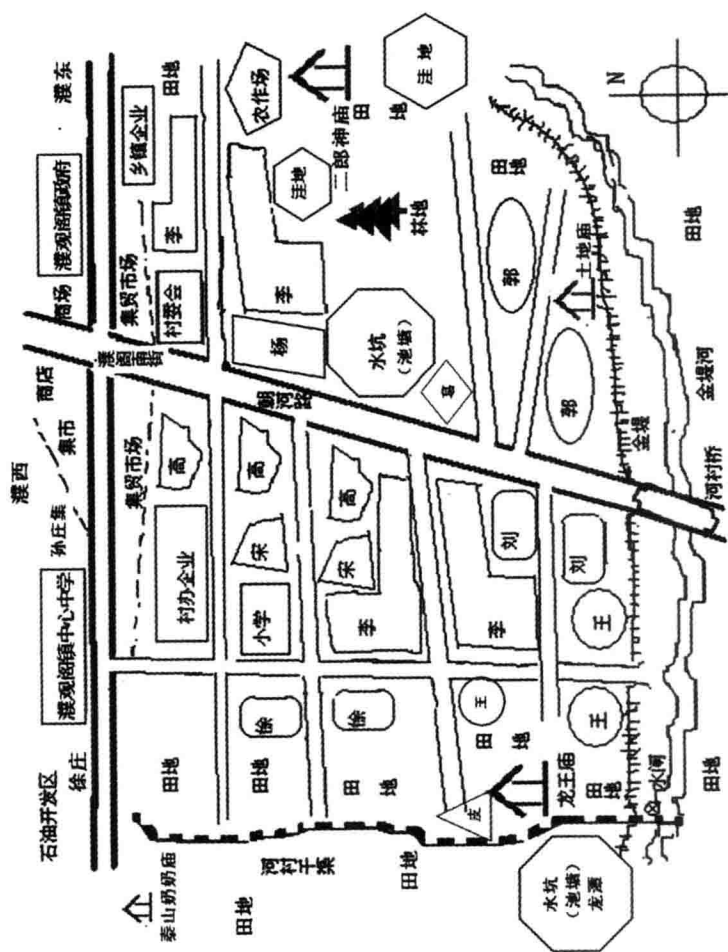


图一：实地调查地点河村在中国的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例：◎镇 ⊗邻省乡镇 ☀县城 ☆河村

图二：实地调查地点河村在山东莘县的区域位置示意图



图三：实地调查地点河村的聚落空间布局

序文

乡土情理，家国天下

1978 - 1987 年，在改革开放史上是一个过渡特征明显的时间段，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在此阶段，持续近 20 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迅速瓦解，中国农民随即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粮食增产和农民收入增长随之发生，国家力量淡出之后，村社传统自然复兴，这种调整和适应似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集体行动也是自然发生的。这种理解和阐释方式实际上是对哈耶克自发秩序思想的朴素应用，这或许是宏观经济社会史中流传最广、也最容易为人所接受的理念之一。

然而，这种宏大粗疏的历史叙事和纯粹经济解释显然不能满足本书作者探究事物本源的好奇心。作者的疑问是：国家退却之后，乡民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正是这看似平常的一问，将我们带入那个熟悉、陌生而又隐秘的乡土世界。

—

作者深受开启“乡土中国”研究先河并集其大成的

费孝通先生的影响，本书的主题选择、行文风格、研究方法和叙事方式，几乎都可见到费老的影响和印记，但这种“仿似”并不妨碍作者提出自己的创见，恰恰体现了一位青年学者高远的学术抱负和自我期许。

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素来为费孝通先生所推崇，他不但终生践行，晚年还在《从实求知录》中以“从实求知”总结自己的学术追求。所以，他很难赞同艾德蒙·里奇（Edmund Leach）所提倡的“人类学是纯粹的智慧演习”、“价值中立的社会学”（value-free sociology）等思想观点。这种实践导向、学以致用学术旨趣，与明清以来的实学思想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对某一个案和类群进行田野调查是费孝通先生经常采用的方法，他在对内蒙古鄂伦春族和黑龙江赫哲族的生存文化考察中，以小见大，看到了现代人或后工业化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而提出了“文化自觉论”。瑰丽、富有魔力的想象与田野书写的独有美感，强烈地吸引着本书作者，引导着作者与理论、经验、现实以及更广阔的历史展开对话。

本书作者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正是对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和旨归的践行，作者将目光投向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以口述史的方式和客观犀利的笔触剖析了一个华北村落河村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背后的意义世界，通过对河村这个具象的切身体验和深入观察，在不断求证中，总结提炼出某些超越具体实践的普遍性观念和思想，让人耳目一新，却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二

作者以河村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集体化农事耕作的组织方式。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其动员方式是什么？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背后的文化指向是什么？这一系列提问，仅凭简单的经验和感觉，是无法完满解答的，只有通过田野调查，深入乡民的内心和日常生活，才能触摸到被时代所忽视以致漠视的乡土社会沉沉跳动的脉搏，才能找到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

作者发现，国家强制力量退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也导致了家庭个体化农耕生活的困难，正是“过日子”的生存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产生了对集体行动的需求。传统的结构性选择和理性选择学说，在应用于解释中国农民的集体行动时，遭遇诸多困难。因此作者另辟蹊径，提出了日常生活实践这一新的视角，从而实现了对“自上而下”（国家中心论）和“自下而上”（日常生活自主论）的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集体行动，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中，展现出理性行动与结构行动相互交融的特征。这种视角本身已经预示了在国家与村社农民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我看来，日常生活实践视角是一种回归本原的、非植入性的、切近本土学术传统的观察方式，与对发展型国家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 Peter Evans 的“嵌入式自治”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河村固然有着自身独特的地方性文化，但从纵向角度看，这种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性演变并不断积淀的结果，从横向角度看，时代正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塑造、

打磨着河村。于是作者不吝笔墨，以“大历史”的眼光观照河村的区域方位、历史演变、文化传承及生态背景，这是理解河村地方性文化、乡民们的性格和日常生活实践逻辑的一把钥匙。然后，作者将目光投向时代巨变下的河村：国家退却之后，社会自主性空间在扩张，生产队解体之后村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农业耕作却陷入了困境，于是村民们求助于拉帮结伙式的非正式合作，但基于家族关系的传统互助行为难以应多资源分散和集体合作群体所带来的挑战，村民们产生了在更大范围进行集体行动的需求。

作者重点关注的是水会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集体行动逻辑。最初水会的组建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家族，其组织化动力来自于村社精英，村社精英的动员方式被作者归纳为：毛泽东信仰中的认同、“造福后代”以及家族情感的渲染。产生了共识之后，村民充分利用街头这个极具公共象征意义的公共空间，来进行参与式集体决策。作者的挖掘并未就此停止，从水会集体决策的方式和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道义性和民主决策的集体主义表象中，作者看到了背后的深层次家庭伦理文化因素，发现河村水会不仅是家族基础上再组织化的社群形态，而且很大程度上又是家族弱化的结果。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再造，不经意间已在乡民们的手中完成，文化的价值意义和工具意义实现了很好的统合。河村水会集体决策背后所援引的一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的规则说辞，体现了一种“乡土情理”和“互惠关系”，展现了乡民们对人与社会关系、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规范化处置逻辑。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统合为一，对立和矛盾消弭了，用来自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和谐主义”来描述乡民的行动逻辑再恰当不过了。

作者进一步通过河村边界水事的处理，来观察集体行动的多种面向。首先是社区权威具有可操作性，权威的产生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权威对民众的态度和行动发挥着导向作用，但又是民众在操作着和培植着权威。挖掘权威获得的背后深层次逻辑，实际上与乡村情理社会中的关系运作与资源支配有关。其次是民众对权威的操作，涉及乡村民众的生存机制，由此所产生的集体行动实际上蕴涵了一种面向集体福利的民间福利模式，其文化指向仍然是和谐主义。再次是从集体行动的地缘政治面向来看，其实质是村落之间获取资源与利益的权力斗争，从河村的地方经验中，作者概括出地缘政治中的三种关系模式：权力、市场和祭祀中心圈，三种关系模式均呈现出“由内到外，由强至弱”的权力与利益谱系，与“差序格局”的圈层逻辑类似。复次是传统的精英生产模式很难概括河村的社区精英形成和生产过程，作者将其归类为“精英复制”的生产模式。最后集体行动实践表明国家与社会或农民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乡村社会排斥或对抗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的渗透，但在寻求利益和资源分配的集体行动中，却又借助国家力量实现目标。国家被迫或采用理性的民间治理方式来治理乡村地方社会（包括将社区精英和民间权威纳入体制、民间集体行动动员和组织方式被国家采用等）。

很明显，在散乱的、不经意发生的日常生活事件背

后，存在着隐秘的、甚至不为村民们所觉察的秩序，作者以确凿的经验证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向我们展现了河村乡民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几乎所有可能的面向，揭示出乡民们面对时代巨变所做出的选择及重构意义世界的种种努力。

三

河村或许只是时代浪潮中的一叶，但它本身却是时代的一个缩影。在社会制度急速变迁的冲击下，家族意识的传统复兴了，但这种复兴并非是向家国传统的复归，而且在短暂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即被国家的制度化改造所打断。商品化、市场化意识形态向农村的扩张和入侵，家族意识的淡化，维系集体认同感的仪式体系的式微，人口的加剧流动，都在从根底上动摇着传统家国文化的基础。河村乡民的集体行动，所能动员的传统文化资源存量实际是不断减少的，不惟如此，当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运动时，农村以致整个中国都面临着这种“现代性焦虑”。

当以家国天下为传统的中国人逐渐远离甚至失去这一传统，乡愁或许会成为几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

是为序。

宋宗宏

2013年6月于广州

目 录

CONTENTS

序 文 乡土情理,家国天下	1
导 言 乡土中国的传统与时代叙事的历史书写	1
第一章 绪 论	
——日常生活实践与乡土情理逻辑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15
研究的缘起	/ 17
探讨的问题	/ 19
两个经典学说与集体行动模型	/ 20
日常生活的视角以及核心概念	/ 23
本书的结构	/ 24
第二章 走进河村	
——田野调查地点的概述	29
区域背景:鲁西粮棉生产经济文化区	/ 31